



复旦
博学文库

“发现”欧洲： 《世界广说》欧洲部分译注与研究

魏 毅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复旦
博学
文库

本书由复旦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发现”欧洲： 《世界广说》欧洲部分译注与研究

魏 毅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现”欧洲:《世界广说》欧洲部分译注与研究/魏毅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3
(复旦博学文库)
ISBN 978-7-309-12788-1

I. 发… II. 魏… III. ①欧洲-概况②《世界广说》-研究 IV. K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16235 号

“发现”欧洲:《世界广说》欧洲部分译注与研究
魏毅 著
责任编辑/胡春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1.875 字数 303 千
201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2788-1/K · 607
定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提起魏源的《海国图志》，大家一定不会陌生，但倘若言及敏珠尔四世用藏文撰写的《世界广说》，除专业藏学研究者外，恐怕知者寥寥。其实这不仅同样是一部描述世界地理的著述，而且其成书的时间也要早《海国图志》近二十年。魏源被视为近代中国汉族群体中开眼看世界的代表，敏珠尔四世则可称作“藏族睁眼看世界之第一人”（房建昌《藏文〈世界广论〉对于中国地理学史的贡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期）。与《海国图志》有感于西方的船坚炮利，本着“师夷长技以制夷”之目的而出现的著述不同，《世界广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想要主动了解西方世界而撰写的地理著作，在中国地理学史与藏族地理学史领域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西方在大航海时代之后即已完成对世界的大体认知，尤其是对东方国家，有了较前更为清楚的了解。相较之下，处于世界东方的人们，特别是中国人，对其自身之外世界的认识还十分有限，虽然自明末已有来华的耶稣会士用中文撰写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著作刊行，但本土士人有关此方面的著述尚未出现。因此当《世界广说》这样的著作问世，其意义的确非凡。

该书的作者敏珠尔四世，又名赞布喇嘛，生活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是青海大通县广惠寺（俗称赞布寺）的活佛，但由于他出任驻京喇嘛之故，多次长时间居住在北京的普净禅林。在京期间，他不仅接触到了早期来华耶稣会士用中文撰写的介绍世界地理的著述，而且还与在华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成员有过颇为密切的交往，使他完成了介绍西方地理的知识储备，最终在1820年将《世界广说》大体撰写完成，并在其后十余年中又对书稿有所修订。

然而对于这样一部奇书，自其出现的近二百年的时间里，除了西方学者对其有所关注，并对其中部分内容进行移译外，国内对《世界广说》的研究还显得十分薄弱，仅限于概述性的介绍，魏毅的这部《“发现”欧洲：〈世界广说〉欧洲部分译注与研究》，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一局面有所改观。

自硕士研究生阶段起，魏毅即在我的指导下进行专业学习。起初他拟随我从事历史疆域与政区地理方面的研究，但一次偶然的事件，改变了他的人生治学轨迹。在他硕士二年级时，有机会到西藏宗教局服务一年，学习藏文，从此爱上了西藏，与那里的风土人情产生了解之缘。他硕士论文选择西藏寺院康村制度方面的研究，便是他立志从事藏学研究的开端。硕士毕业工作后的几年里，仍心系藏学。重返复旦攻读博士学位之后，他向我提出以《世界广说》这部在国内鲜有深入研究的藏文地理著作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我感动于他的执着，虽然知道从事此项研究的难度甚高，但还是同意了他的请求。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稿，即是魏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之上修订完成的。论文的学术价值，已得到包括藏学名家王尧先生在内的五位学者的高度评价，本无需我再赘语。但考虑到一般读者对《世界广说》的了解有限，所以在此我还是想再择要谈一下魏毅对《世界广论》一书所做的一些深入开掘。

《世界广说》一直以写（抄）本的形式流传，并未刊刻，这就势必会造成较为严重的不同版本之间的文本差异，因而在对这部书深入研究之前进行一次详尽的校勘，就显得十分必要。本书作者魏毅以相对文本错误较少、抄写时代较早的拉萨本（1986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影印本）为底本，以甘托克本（1981年锡金甘托克影印本）与新德里本（1980年印度新德里影印本）为通校本，并以新近国内出版的两部排印本为参校本，择善而从，最终形成了一部目前校勘最为精良的《世界广说》（欧洲部分）文本。不仅为本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今后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便利。这部分的校勘工作，看似简单，实则绝不轻松，凸显了作者严谨扎实的学风与精准

的判断选择能力,如果没有过硬的藏文阅读能力与相关的知识积累,恐怕无法胜任这一工作。

对于一部书的史源学的探讨,深入了解该书的知识构成尤为重要。我们知道,魏源《海国图志》主要是以《四洲志》为基础而编纂完成的;敏珠尔四世一生除可能短期到访过印度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土,其所撰《世界广说》一定也有蓝本。由于敏珠尔四世在京城有与俄国东正教传士接触的经历,所以此前有学者认为《世界广说》中有关西方地理的知识是源于俄国的。然而,以书中经常提及的“《地球书》”为线索,经过悉心的文本对勘研究,魏毅不仅否定了该书知识来源的“俄国说”,同时也排除了采自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南怀仁所著中文著作《坤舆图说》的可能性,而最终认为应当是源自来华时间更早的另一位耶稣会士艾儒略用中文撰写的《职方外纪》——《世界广说》欧洲部分的描述主要即来自该书,或引录,或改编,或扩充,不一而足。从魏毅书中列举的具体实例来看,这一说法可成定谳。

除去从特定的文本上获取知识来源,敏珠尔四世还将他在北京与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成员交往中听到的讲述,写进了他的《世界广说》。敏珠尔四世在书中提及了三位外籍人士向他讲述了西方的地理知识:来自莫斯科的“太医”奥西普(O zhi phu)、来自波兰的“小官”奥西普(O si phu)以及来自俄罗斯的“监护官”米哈伊尔(Me ha wū)。这三位究竟为谁,此前并未有人深究。魏毅经过悉心的人物事件比对,将这三位人物分别与其时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第十届、第十一届布道团中的三位非神职人员一一坐实,并进而对其中的一位奥西普(O si phu)即第十一届布道团临时差遣人员奥西普·米哈伊洛维奇·科瓦列夫斯基在《世界广说》撰写中的贡献进行了详细的论证,推翻了此前学界认为此人不可能参与其中的不实观点。魏毅的这部分研究,使我们仿佛看到当年敏珠尔四世与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部分非神职成员过从甚密的场景,对于了解《世界广说》一部分文本信息来源,极为重要。

在一项研究大体完成之后,如何将研究的成果清晰晓畅地表述

出来,对于研究者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从魏毅这部书的框架结构与各章的展开形式,可以看出其良苦用心,尤其是本书第二部分的文本校勘与考释,此点颇为突出:各章节之前首置“章节提要”,然后再做细致的藏文转写与文本校勘;在这一基础性的工作完成之后,复对藏文文本进行汉译,并做详细的注释。这样的构成形式,既为专业藏学研究者利用《世界广说》藏文文本进行深入探究提供了依凭,同时也为一般读者阅读与了解该书提供了不少的便利。

除上述所言及的诸端之外,本书之中还有一些或大或小的发明与创见,读者诸君自会一一体悟,在此无需我再多言。要之,魏毅的《“发现”欧洲:〈世界广说〉欧洲部分译注与研究》,是一部悉心研究的力作,使敏珠尔四世《世界广说》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准。

当然,由于《世界广说》以写(抄)本流传的特点,各版本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承继关系尚有待进一步明确;除欧洲部分外,《世界广说》还有其他地区的记载,其中反映的诸多地理信息,也尚有进一步开掘的空间;与《世界广说》差相同时的藏文地理著作还有松巴·益西班牙觉的《世界总说》等,其彼此之间的内容异同,也值得进一步探究,期待包括魏毅在内的诸位藏学研究者在此研究领域取得更大的成绩。

李晓杰

2017年2月

目 录

绪论	1
----------	---

研 究 篇

一、作者敏珠尔四世生平研究	17
1. 敏珠尔活佛世系及驻锡寺院简述	19
2. 敏珠尔四世之生平履历	22
附：敏珠尔四世年谱	26
二、《世界广说》诸写本及书名释义	33
1. 版本对勘之必要性	33
2. 早期写本综述	35
3. 晚近写本综述	37
4. 《世界广说》书名释义	38
三、《世界广说》成书年代研究	43
1. 学术史梳理与方法辨析	43
2. 甘托克本非 1820 年成书	47
3. 新德里本、拉萨本非 1830 年成书	49
4. 《世界广说》之渐成与最终成书年代	52
5. 本章小结	55
四、《世界广说》与《职方外纪》文本关系研究	58
1. 研究现状及相关线索辨析	58

2. 《世界广说》对《职方外纪》之引录	61
3. 《世界广说》对《职方外纪》之改编与扩充	92
4. 本章小结	97

附

(1) 《世界广说》中源自《职方外纪》的地名、人名及物名	98
(2) 西班牙托莱多大教堂圣体龕图	100
(3) 西班牙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内的六位犹太王塑像图	101

五、敏珠尔四世与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成员交往

研究	107
1. 俄罗斯的“驻京喇嘛”	107
2. 《世界广说》中的俄罗斯布道团人物考	109
3. 文本所见之交流内涵	116
4. 本章小结	123

六、《世界广说》之 Me-pa-rā-dza 及“靴王”(Lham gyi

rgyal po) 考	128
1. Me-pa-rā-dza: 麦哲伦抑或哥伦布?	128
2. Me-pa-rā-dza 即《职方外纪》之“墨瓦兰者”	131
3. 哥伦布之“转轮王”尊号	133
4. 本章小结	140

文 本 篇

转写、校勘与译注凡例:	147
一、欧洲总论	148
二、西班牙	200
三、法国	221
四、葡萄牙	235
五、意大利	238

六、德国	254
七、奥地利	263
八、匈牙利	275
九、东南欧诸国	278
十、波兰	294
十一、俄罗斯	298
十二、普鲁士	311
十三、丹麦	314
十四、荷兰	317
十五、英伦三岛及其西北诸岛	321
十六、瑞典和挪威	331
十七、格陵兰岛	336
十八、冰岛	338
附录	341
词汇表	341
参考文献	355
后记	367

绪 论

Lho 'dzam bu gling gi sa cha la |
spre'u grangs kyis mi langs yang |
phal cher la dang klung gis chod |

——*Bya sprel gtam rgyud*

南瞻部洲各地

猴子多得不计其数

但大都被山川阻隔

——《猴鸟故事》

Sie können sich nicht vertreten, sie müssen vertreten werden.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一)

三年前的夏天,我结识了一位藏族朋友,她当时正在我就读的学校进修,这种进修由中央组织部统筹安排,为期一年,学员以西藏自治区的高校教师以及报社、电台等文化部门的从业者为主。组织者的初衷,是希望借助内地一流大学的教育资源,丰富西藏本土精英的知识结构,促成国家以及民族之间的心理认同。然而,让组织者始料未及的是,这些来自西藏的知识界人士,包括我的朋友在内,最有兴趣旁听的,并非中国史、汉文典籍、世界文化之类的课程,而是边疆史地、佛教史等与藏地相关联的内容——相对于外部世界的知识,这些有资格代言藏族文化的当代学者,似乎更关心外部世界对于西藏的观点。

机缘巧合，这座“沪滨屹立东南冠”的江南名校，经由学界诸隼绛帟启风，印度学、藏学等东方学分支悄然扎根，竟成一时风尚。我和这位藏族朋友就是在一节名为《藏传佛教导论》的课堂上认识的；我确信，如果她能够忍受入门者“Ka kha ga nga”的重复呓语，我们也一定会成为藏文班的同学。

时光飞逝，我的这位朋友决定和她的藏族同学去一趟乌镇，以此告别一年的汉地生活。旅行归来，她兴奋地向我叙说旅途中的“异闻”——因缺乏“时间观念”而误车、错过宾馆关门时间而睡澡堂子、露天聚餐喝酒被“请”进派出所……最有趣的，莫过于这些藏人对导游册子上宣传的乌镇“美景”毫无兴趣，“风景比西藏差远了”，她说。留给她印象最深的两件事，一是街边某间店铺里供奉着一尊造型奇特的佛像，二是景区的厕所——“太大！太豪华！比周边的民居好得多！”城市咖啡馆格调优雅，我们聊得眉飞色舞，旁若无人。

出于一种“文本性的态度”，我请求她将旅途见闻写下来，我想这应该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书店的畅销书架摆满了各种类型的西藏游记，以“洋人眼中的西藏”为主题的译丛也有厚厚一摞，却鲜有以藏人视角观察外部世界的作品，何不就此写一篇“藏人眼中的乌镇”？逐日软磨硬泡，两周后终得一文，五千余言，展卷细读，发现先前闲聊中的若干“敏感”话题已然不见，不禁莞尔；进而求此文“一用”（其实我并未想好该如何用），却遭断然拒绝——虽未言“阅后即焚”，却也只能到此为止。

这一幕往事——当我完成《世界广说》（*'Dzam gling rgyas bshad*）三种写本的校勘，对于作者敏珠尔四世终未将该书刻板印行而百思不得其解时——从记忆库里跃然苏醒，映入眼帘。两百年前，这位出生安多藏区的转世活佛在北京完成这部描述世界地理的藏文著作时，是否也怀有一份不愿教人阅读的隐秘心绪？而支撑这种心绪的背后又是怎样一种更为宏大的“时代精神”（*Zeitgeist*）？

藏学，作为研究藏族和藏族地区历史、政治、宗教、社会 and 科技等领域的综合型学科，在现代学科分类体系中毫无疑问地被列入东

方学(Orientalism)的门下,并在其诞生之初即接受东方学学术核心与趣味的指导——“关于东方人和与东方人有关的知识,包括其民族、性格、文化、历史、传统、社会 and 可能性”。以对某个特定地域和族群“地理想象”的方式命名学科,更彰显出其思维模式是以“东方/西方”、“藏地/藏地以外”这种“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区分为基础”^①,在此范式下,藏地或藏人沦为无法主动言说的客体,只能接受他者的表述。

对于此种“文化霸权体系”设计、发展和演化的过程,萨义德已有精辟而令人信服的阐述,其《东方学》于1978年问世以来,在东西方知识界,尤其是政治学、宗教学、区域研究和比较文学等领域所引发的持续讨论热潮,竟连作者自身也“感到诧异”。学界更以其理论为批判利器,对以往奉为主臬的东方学论著大加鞭伐,甚至令一些出身东方的学者在“手舞足蹈”之余,亦颇觉“矫枉过正”^②。笔者无力整体探讨萨氏精深严密之大作,仅提出与本文主旨相关的一个议题回应萨义德对东方学的意识形态批判——对于东方学领域体现出的对于东方的误读与偏见,究竟如萨氏所言,是东西方之间本质上“强弱关系”衍伸出的“学术权力”^③,抑或当依翁贝托·埃可(Umberto Eco)阐述,为一种由人类共有的“背景书”(background books)而产生的殊难逾越的“阐释学循环”(hermeneutic circle)^④?换言之,东方民族,即便如萨义德所言被视为“弱者”,是否也存在将西方塑造为“他者”,并借此确立“自我”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是否同样伴随着误读与偏见?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造成误读与偏见的原因又是什么?

萨义德并未回避此问题,或者说他没有拒绝东方与西方主、客体身份的转换,但萨义德并不认可“内部视角”比“外部视角”更优越的观点^⑤,他将东方“内部”视角归结为弱势一方由西方霸权带来的“生成性”(productive)^⑥。此种“生成性”有两种表现,一为“东方民族参与了其自身的东方化”,即如王明珂所言,“东方国家的不少学者一方面以研究‘本土文化’为荣,另一方面把对西方的东方概念的‘学习’视为本土文化研究的必备条件”^⑦;二为东方弱势民族

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叛逆式抗争，导致狂热的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这也是萨义德在 1994 年所补作的《东方学》后记中竭力抨击的“反西方论”(anti-westernism)^⑧。

很明显，萨义德缺乏一种历史主义的考察视角，将东方民族的“内部视角”简单视作对东方学意识形态化的被动回应，实则与作者的批判对象一样，陷入一种东方主义的偏见。而萨义德的论敌、被其讽为“大师”的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却对东方的“内部视角”有着独到见解，他阐述了 8—19 世纪穆斯林对西方的认知史，将 19 世纪初看双方认知角色互换的一个时间节点——在此之前，“基督教欧洲对中东语言及文化兴趣盎然”，而“穆斯林对基督教欧洲却无同样的关切”，刘易斯认为，对此现象的追问是一个伪命题，“心态正常的是穆斯林，而非欧洲人。对他国文化没有兴趣，实属人之常情”^⑨。与此种情形极其类似，1783 年，东印度公司上尉塞缪尔·特纳(Samuel Turner)出使扎什伦布寺，开明而乐于接受新信息的仲巴呼图克图竟向其表示，“大量英国人背井离乡，离开国家和朋友……的原因”，“是由于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内各方面的匮乏而造成”^⑩，如果我们不将藏人置于认知主体的地位，进而忽视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则很容易把此番话语的内涵解读为“由西方帝国主义霸权‘生成’的封闭心态”。

(二)

回到刘易斯着重关注的时间节点——19 世纪前半期，这确实是西方与东方(包括穆斯林、印度、西藏以及更远的东亚)势力消长的分水岭；而相对于 18 世纪的零星成就，西方主导的东方学于此时获得系统发展，维也纳会议(1814—1815)之后，东方学已经发展为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巨大的学术宝库”，如维克多·雨果在 1829 年描述的那样：“现在，人人都是东方学家。”^⑪这一时期东方学的突破进展发生在藏学和蒙古学领域——1820 年，匈牙利人亚历山大·乔玛(Alexander Csoma)为了寻找马扎尔人的族源远赴东方，在藏区边缘的拉达克精研藏文，于 1834 年出版《藏英辞典》和《藏文文

法》等著作,被西方藏学界公认为藏学的奠基人;几乎与此同时,波兰人奥西普·米哈伊洛维奇·科瓦列夫斯基(Осип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овалевский)于俄罗斯喀山大学建立蒙古语教研室,并相继出版了《蒙古书面语简明语法》和三卷本《蒙俄法语词典》等著作,并培养了一批杰出的蒙古学家,被誉为俄罗斯蒙古学的奠基人。

与西方的热情探索相比,此时的东方人,无论是穆斯林、藏人抑或汉人,对于西方世界都显得漠不关心——在与西方接壤的阿拉伯世界,直到1820年代以后,由于统治阶层的主导和印刷机、报纸等媒介的普及,方才引发知识阶层对西方世界较为广泛的兴趣^②。在藏区,由于欧洲人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加之俄罗斯治下信仰藏传佛教的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僧侣和朝圣者,以及为数众多的印度游方僧在藏区的活动,关于欧洲历史、宗教和地理的知识零星传入西藏,然而并未引发藏地知识阶层系统化的主动描述,19世纪末著名的藏族学者——六世班禅和松巴·益西班觉——前者虽然有着浓厚的地理兴趣和宗教平等眼光,却依旧执迷于对香巴拉的宗教地理学探讨;而后者也仅仅将地理视野的西部边界延伸至伊斯坦布尔。在汉地,虽然传教士引介西方文化的努力已持续近两百年,但汉地文人以西方为主题的著述依旧凤毛麟角,19世纪初的情形较之明末的喧嚣场景甚至出现了倒退;汉地文人对西方重燃热情则要等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以《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为代表文本——很明显,这种热情和同时期穆斯林的情形颇为相像,借用萨义德的话语,皆为一种“生成性”的关注。

如此略显沉寂的时刻恰似暴风雨来临前的片刻宁静,而敏珠尔四世的《世界广说》于此间诞生,令人颇有横空出世之感,因此,亟须在中国地理学史和藏族地理学史两种范畴内略述《世界广说》的文本地位。首先,将《世界广说》置于中国地理学史的视域之下,并非源自某种政治归属的现实抑或笔者自身的国籍族裔,而基于对该书作者和写作背景的历史主义考察,作者长期居于北京,位列驻京喇嘛“左翼二班”之高位,就身份认同和政治倾向而言,谓其清王朝的“御用高僧”,相较“藏族活佛”更为贴切;以《世界广说》的知识来

源来看,对其文本贡献最大的恰是两部汉语地理学文献——《大唐西域记》和《职方外纪》,因此,《世界广说》无可置疑当列入中国地理学史范畴,坊间著作大多对其漠然无视^⑬,实属不当。房建昌对此种学术偏见早有抨击,他将《世界广说》的文本地位与《海国图志》并列,称其为“藏族睁眼看世界之第一人”^⑭;考虑到《世界广说》的成书年代较《海国图志》早将近二十年,且其描述的地理范围涵括全球无遗,因此,该书在中国地理学史上的地位亦当重新考量评判。尤为重要的是,《世界广说》并非一部应对殖民主义压力的“生成性”文本,这是它与稍晚成书的《海国图志》最本质的差异,对于二者的不同,不妨不加批判的借用“睁眼”一喻——如果说《世界广说》是“自然醒”,那么《海国图志》则属“噩梦惊醒”。

相对而言,如何评价《世界广说》在藏族地理学史中的地位却更为艰难。虽然学界对于将该书置于地理或游记类文献并无异议^⑮,但却鲜有横向或纵向的比较。究其原因,一方面,学界迄今并未搭建起藏族地理学史的学科框架;另一方面,对于藏文地理典籍的关注,学界更偏重于文本涉及的地理知识本身,而对知识的传播,以及支撑知识的地理观念缺乏系统探讨。因此,从文本内容上看,《世界广说》确为藏族地理学史上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著作,但文本背后闪烁的地理观念,未必无脉络可循。藏人的地理观念,虽然在吐蕃时期亦有“四天子理论”衍伸而来的“吐蕃中心观”^⑯,但伴随吐蕃帝国的覆灭,以及意识形态的日益佛教化,此种地理观念不复存在。当欧洲、汉地和阿拉伯世界因各自的“本土中心主义”而终致文明冲突时,藏人却奉行“圣地在别处”的独特理念——无论是佛教的发源地印度,还是未来佛教的救世国香巴拉,皆不列于藏地本土。因此,对于藏人而言,地理视野的扩大和地理知识的累积并未引发如同汉地天下观念崩塌的革命性效果,而可以在旧的地理框架中自如安置。以《世界广说》为例,对于首次以完整地域形态“出现”的美洲、非洲、澳洲,敏珠尔四世很自然将诸者比附为佛教地理视域下的北俱卢洲、西牛货洲和东胜身洲;而对于欧洲,作者显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新兴而强大的文明体系,在高度赞

扬的同时,更以藏传佛教地理观中的“香巴拉”的名号泰然处之。此种阐释模式并无太多的颠覆意义,结构照旧,自我照旧,“他者”亦未发生本质变化,旧瓶装新酒而已。因此,对于藏族地理典籍和地理观念的理解,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虽然不失为一具利器,但眼下亟为迫切的,更应当重拾为萨义德批判的那些东方学者们的优秀传统——回到藏族自身,回到文本自身——而《世界广说》无疑是一份的藏族本土视角下的珍贵文本。

(三)

西方藏学界对《世界广说》的关注由来已久,事实上,在《世界广说》撰写过程中,西方学者即有参与,前述两位西方学者——乔玛和科瓦列夫斯基——皆与敏珠尔四世有亲身接触,并成为作者了解西方世界的信息来源。《世界广说》德国部分提到的那位与作者“长久闲谈”、名为亚历山大(A lag sän dri)的“小官”,是否即为乔玛?而作者与科瓦列夫斯基的交往则有更多文本印证,在《世界广说》波兰部分,敏珠尔四世描述了这位波兰移民留给他的印象——“聪明、谈吐文雅”。这一幕场景极富戏剧性,乔玛和科瓦列夫斯基日后分别被封为西方藏学和蒙古学的开山鼻祖,而对“他者”同样怀有探索热情的敏珠尔四世,却并未在东方建构起一个“西方学”的学科门类,只落得一个“藏族学者”的头衔。遥想双方使用藏语和蒙语相互交流的最初情形,此种学术史上的迥异境遇不由得让人联想起萨义德着力批判的“学术权力”。

此种学术评判标准和趣味几乎统治了《世界广说》的研究史,对于这样一份描述世界地理的藏文著作,学术界的关注大多局限于藏地部分,通常将其看作该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①。藏地部分内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敏珠尔四世藏人言藏的知识背景、亲身履足的游历生涯,使得藏地部分内容较之同时期松巴·益西班牙觉(Sum pa ye shes dpal 'byor)的《世界总说》(*'Dzam gling spyi bshad*)和蒋扬钦则旺布(*'Jam dbyangs mkhyen brtse'i dbang po*)的《卫藏道场胜迹志》(*Dbus gtsang gnas yig*)等,涉及地域更广,叙述更为翔实。迄今至少